

新基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为了让新基建转化为生产力,数据是最为关键的要素——

抓住“数权”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多个文件出台,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指明了方向,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自去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以来,全国已有多个数据要素市场纷纷挂牌,在建的大数据交易中心项目也不在少数。同时,头部企业也竞相入局,携手地方政府加快项目落地,并在数据生产、管理、使用、流转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

然而,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数据要素市场,仍面临数据确权、开放共享、自由流动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掣肘。为适应新基建对大数据自由流动的发展需求,下一步应着力破除制约因素,完善配套措施,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数据治理监管体系,使数据要素充分参与市场配置,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交易挂牌易、激活难

自2019年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以来,全国多个数据要素市场纷纷挂牌。

去年5月,天津市委网信办、浪潮、中国建设银行签署数据金融合作备忘录。具体合作内容包括建立数据运营公司、设立数据交易中心,打造“以数据为核心、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数据交易模式。

指导性政策文件的发布,更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指明了方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并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纷纷按下数

字经济重大项目建设的快进键。

湖南大数据交易中心项目近期在长沙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将进一步推动湖南数字经济产业战略布局。在浙江,总投资158亿元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将助力浙江省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

与数字交易项目纷纷开通、挂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要素市场化交易似乎没有被激活。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近一年来,全国数据要素市场整体尚处于筹备阶段,发展缓慢。

记者从东部某地网信办获悉,近一年来该地数据交易中心进展较为缓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推动相关工作,目前在起草一个管理办法,但还没有到征求意见的阶段。整体来看,

“仅仅停留在酝酿阶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去年,西部某地出台了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基本形成了政务数据资源采集、汇聚、共享、开放、应用全链条及安全、监督全覆盖的管理体系,其中在共享环节,明确提出“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合理行使数据要素定价自主权,探索开展大数据衍生产品交易,鼓励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换和交易,激发交易需求”。但记者采访时,工作人员表示“主要还是在探索阶段,没有什么东西可谈”。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有丰富的大数据合规及交易经验的专业律师金路循介绍,就他所在团队接触的案例来看,虽然全国挂牌大数据要素交易中心数量不少,但实际上并没有一家真正起步。

数据确权难、交易成本高

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数据标准化、数据确权、开放共享、自由流动和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阻碍,制约了数据交易市场的起步和成长。

——数据要素确权、定价面临困难。数据作为一种虚拟物品,其权属不同于传统物权可以被直接支配,数据权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中有不同的支配主体,所有权并不一定完全属于某个经济主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工程师袁博说,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价值和成本的计量方法,数据仍是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的附属产物,很难将数据价值和成本从业务中剥离,难以通过市场直接定价。

在医疗数据领域,患者是数据源,医院是初级集纳方,大数据企业是终极集纳方。汇总后的海量数据属于哪一方,目前仍是灰色地带。

——数据标准化不足。从分散于

各处、掺杂着大量个人隐私的原始数据,到可在全社会公开流转的规范要素,中间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记者在天津、重庆、浙江等多地走访发现,数据标准化工作在新兴行业不成问题,但在传统行业阻力重重,远未达到可以进入要素市场流通的规范程度。

——数据要素交易成本过高。当下,我国数据要素交易成本过高,数据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存在诸多瓶颈。



袁博说,拥有大量数据资源的企业往往重视构建闭环生态,而轻视数据共享。数据孤岛普遍存在,甚至形成了一定的数据垄断。数据要素越发分割、分散,难成体系,难以发挥数据要素应有的价值。

同时,由于缺少相适应的技术标准、规范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分配机制,在数据流通方面,各机

构顾虑重重,可信流通难以达成,数据滥用、非法交易频现,极大降低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任重道远。数据共享的巨大红利在各行业已充分反映,但同时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时有发生。无论监管层面还是行业内部,对原始数据做去标识化处理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规则普遍缺失,各

方无法在“合规合法使用大数据”和“保护用户个人隐私”中真正划出红线。

金路循认为,从现有民间交易形式上看,双方自行协商签订合同就可达成交易,通过服务器或其他数据载体直接交付就可完成数据资产转移;从内容上看,具体合同条款大多含糊,不注意法律边界。

将“数权”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来抓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数据要素治理监管体系,以充分挖掘和释放数据要素应有的资源价值。

目前,国家层面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顶层规划已经出台,相关部门和各地方需加快制定出台相关行业、地方政策作为配套补充,为数据要素有效配置进一步提供政策指导。

将“数权”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来做,适应新基建对大数据自由流动的发展需求。全国政协委员、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连玉明认为,人权、物权、数权将成为未来人类生活的三个基本权利,

应有针对性地对“数权法”进行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蓬勃发展,数据权属生成过程愈加复杂多变。袁博说,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确权、定价问题均是巨大挑战,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交易权等权益没有被相关的法律充分认同、明确界定和完全保护。当下我国与数据确权、定价相关的行政立法、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则亟须建立。

“典型的、具有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判例还未产生,主要原因是数据案例大多是侵权纠纷,从交易合规角度产生的争议往往双方都有法律瑕疵,不愿提到法院层面,个别案例的判决依据也仅引用传统民法理论,对行业发展研究启发不大。”金路循说,“更多的是各个领域不规范使用

带来的处罚,有什么不能做,没有对什么能做、该怎么做的指导。”

构建数据要素监管体系。为确保数据要素资源长期发挥价值,应当加快构建多元共治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体系。袁博建议,完善立法,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在组织管理层面可考虑在地方成立运行机制相对统一的数据管理综合部门,有效指导数据治理相关工作。

此外,还要警惕数据垄断,强化数据要素的市场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和健康运行。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数据资源利用行为。

(据新华社)

瞭望



长沙市滨江新城新区核心位置,新开发的精装修楼盘每平方米房价在15000元左右

■刘良恒 摄

强力调控去“虚火”

2018年6月,《湖南日报》连续发表4篇署名“晨风”的评论文章,就如何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亮明态度。

彼时,在一线城市楼市“虚火”带动下,长沙出现炒房现象。尽管商品住宅供求关系整体平衡,但由于一些开发商捂盘惜售,部分中介哄抬房价,少数自媒体搅乱市场,散布“楼市库存着急”等不实言论,加剧市场紧张情绪,出现“全民进场,遍地刚需”的情景。

此前,长沙房价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受单位自建房较多等多种因素影响,2012年前后,长沙主城区多数新建商品住宅每平方米价格在5000元左右。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房价出现“跟涨”“补涨”甚至“跳涨”现象。有一名购房者,2014年到一处楼盘看房时,每平方米均价还只有4000多元,4年后再去看时,已上涨到12000元,并且需要摇号,中签率不到6%。

针对市场高烧不退、炒房成风的表象,“晨风”系列评论文章一针见血指出,房价高企的症结,并非供需矛盾,而是投机行为作祟。并明确提出,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政府必须保持定力,不能被房地产商、不良舆论绑架,听任市场炒作者兴风作浪。省会城市的楼市乱象,被省委机关报连发重磅文章批评,非同寻常。直接促成了长沙市更为严格、更为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2018年6月,长沙从项目监管、土地出让、购房资格、户籍管理、打击炒房等方面对楼市全面调控。一是严控土地价格,改变出价最高者得的土地竞拍方式,实行最高限价和熔断机制,防止地价推高房价;二是严控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三是严格购房资格审核审查;四是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炒作;五是严控住房交易。购买首套房,需要落户满1年,或连续缴纳24个月个人所得税;购买第二套房,需要首套房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4年;商品住房上市交易,需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4年。

随着调控力度加码,长沙楼市逐

步回归理性。据长沙市住建局提供的数据,2018年、2019年、2020年1~4月,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7938元/平方米、8267元/平方米、8527元/平方米。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长沙经济总量排名第16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第11位,但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却排在第64位,是名副其实的房价洼地。

一房稳满城活

人们通常用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相关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在3倍至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超过6倍,意味着房价可能过高。

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在6倍以上,一线城市甚至超过20倍。2019年长沙房价收入比为6.4倍,居全国50个主要城市末位。

长沙市委政研室主任段宁等人认为,长沙相对较低的房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已经凸显。

长沙房价洼地效应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长沙经济总量排名第16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第11位,但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却排在第64位

长沙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不到40%,有效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被高房价绑架,同时也倒逼政府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来开辟财源

长沙,有“网红城市”之称。这里有深受年轻人追捧的综艺节目,有吸引八方来客的“打卡圣地”,有口味纯正的“苍蝇馆子”。

这一切,与长沙的低房价不无关系。买一套位置、品质大致相当的房子,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大概每平方米需要6万元甚至更高;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需要三四万元;在长沙,只需要1万元出头。

长沙经济实力并不弱。2017年,长沙成为全国第13个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元的城市。长沙城镇居民收入也不低。去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211元,在全国17个经济规模过万亿元城市中居第11位。

但论房价,长沙却是洼地。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到2019年底,在全国17个经济规模过万亿元城市中,长沙房价最低;2020年6月、7月,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均排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第64位和30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不包含拉萨、台北)的第25位。

作为“网红城市”,长沙的房价洼地是如何形成的?低房价又给这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效应?

避免沦为“房奴”,居民幸福感强。在有关机构组织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中,长沙已连续12年入选。居住成本较低,是重要原因之一。

长沙居民自有住房比例位居全国大城市前列,许多大学毕业生工作六七年后,基本能自食其力购买一套住房,外来务工人员也相对容易实现住有所居。据长沙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516元,其中居住人均消费支出7628元,仅占19%。

房价洼地成为吸引人才高地,城市竞争力增强。近几年,长沙每年净流入人口都在20万人以上,位居国内城市前列。长沙吸引大量工程师、创新人才的优势之一,就是房价较低。

低房价降低了创业门槛,促进了城市繁荣。2019年,长沙市场主体突破100万户,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量位居第一。

长沙是全国知名的消费型城市,在有关机构评选的中国十大夜间经济影响力城市中,长沙位居第三。长沙还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夜间经济十强城市”之一。由相对低廉的房价带来的创业低成本,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胡荣才认为,如果房地产消费过大,就会对其他消费造成挤出效应。长沙市民购房负担不重,所以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应对挑战看定力

必须承认,对于长沙的低房价,不同群体因利益诉求不同,也有不同声音。

一名参与制定长沙楼市调控政策的干部说,长沙是房价洼地,客观上助推了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需求。一旦调控松动,房价有可能出现报复性上涨。此外,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出于提升家庭资产价值的需要,也有希望房价上涨的意愿。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长沙财政增收压力加大,希望放松楼市调控力度,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声音增多。一些开发商也通过各种渠道“喊话”,试图影响政府调控政策。

要不要守住低房价?能不能守住

低房价?湖南省和长沙市两级党委负责同志均作出了肯定回答。

湖南省委负责同志认为,政府财政如果是土地财政,当然是房价越高越好,房价越高,意味着土地收入越高;从地产商角度来讲,当然也是越高越好,房价越高,利润越大。但是,房价低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能让创业者有更加合适的成本。要保持定力,让人民群众买得起房,让到湖南投资兴业的人买得起房。

业内人士认为,长沙市“稳房价、稳地价”系列举措,摆正了短期利益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关系。目前,长沙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不到40%,有效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被高房价绑架,同时也倒逼政府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来开辟财源。

长沙市委负责同志表示,卖地来钱快,但不可持续;制造业发展慢,但后劲足,是立市之本、强市之基。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面前,长沙坚决选择后者。抑制房价“虚火”、做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这条路,长沙会一直走下去。

(据新华社)